

“山庄”不仅为避暑而建

位于河北省承德市的避暑山庄(热河行宫)是清代皇家园林、避暑胜地,清廷花费了89年才修建完成。如今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中国四大名园之一。鲜为人知的是,其建造的初衷并不仅仅是为了避暑。

京北兴建政治活动中心

清代皇帝每年夏季来到避暑山庄,秋季返回京城,乾隆在《避暑山庄百韵诗》的序中写道,他的爷爷康熙帝始建避暑山庄,主要目的是让没有得过天花、没有产生抗体的蒙古四十八旗王公有机会觐见皇帝。

清朝是我国天花流行最猖獗的时期,天花又名痘疹、痘疮,是一种古老的疫病,传染性很强。很多王公多次表示希望进京觐见皇帝,但又害怕染上天花。京城天花流行时期,有王公上书康熙皇帝,希望他驾临北疆,以满足他们仰望圣帝的愿望。于是,康熙皇帝不得不考虑在京城外建立一处政治活动中心。

康熙帝在热河巡查时,发现这里不仅是连接京城和蒙古高原的咽喉之地,而且有利于隔离天花病毒传播,自然气候条件还适合避暑、休憩,因而下令建造一座行宫,这就是避暑山庄的由来。

康熙四十二年(1703年),设置热河总管掌管避暑山庄及各庙宇的陈设、洒扫、修缮、守卫等事。从这一年起,历经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,耗时89年建成避暑山庄。

清代皇帝每年5月来到山庄,10月前后返回京城,在这里围猎、召见群臣、批阅奏章、接见未出过痘的蒙、回、维等少数民族贵族及举行其它政治活动,驻蹕近半年之久。

康熙皇帝在热河除了建造避暑山庄,还采取了相应的围班制度,以利于未出痘的蒙古各旗首领参与其主持的政治活动。所谓围班,就是皇帝每年秋天在热河举行围猎时,边区蒙古及西北民族部落首领分批觐见皇帝,并参与皇帝主持的围猎、宴席等活动。位于热河西北部的木兰,面积近万平方公里,这里林深菁密,水草茂盛,是极好的狩猎之地。

围班制度是年班制度的补充形式。根据清朝制度,蒙古各旗王公每年年末都要进京觐见皇帝,在京城停留40余天,称为年班。其间,他们向皇帝献上贡品,皇帝也会回赏礼物,设宴招待他们,举办各种欢庆活动,并了解各旗政务,以加强对蒙古各旗的管理。清初京城天花流行之时,为避免天花传染,皇帝下令,凡是没有出痘的蒙古王公不得年底来京朝觐,但可以七月到热河,九月随皇帝木兰围猎,皇帝也可借此机会接见他们,并给予各种赏赐及娱乐性招待。热河地广人稀,有利于避免天花传播。而在将近20天的围猎行程中,皇帝与蒙古王公亲密接触,共同生活,关系进一步融洽,达到了年班的效果。

皇帝为“避痘”免朝贺

人们为了“避痘”想出了很多办法。避痘就是避开患有天花的病人或

病毒环境,顺治皇帝采取的是停止大规模朝会或出官留宿的避痘方法。

元旦(农历大年初一)、万寿节(皇帝生日)和冬至日,是清代帝王极其重视的节日。然而在疫情期间,为避免百官聚集产生交叉感染,顺治帝曾取消了朝贺活动。据《清史纪事本末》记载,顺治六年(1649年)大年初一,由于京城天花流行,皇帝下令免去了朝贺礼(“帝避痘免朝贺”);据《清圣祖实录》记载,顺治三年(1646年)正月万寿节,由于疫情,下令免去了朝鲜及藩部蒙古朝贺礼(“京城痘疹盛行,免朝贺”);顺治二年(1645年)冬至,下令免庆贺礼(“以京城出痘疹者众,免行庆贺礼”)。《北游录》之“避疹”记载,顺治十二年(1655年)十一月,顺治帝的第二位皇后即孝惠后出痘,皇帝急往南海子“避痘”,并下令宫中每天去送炭的人,无论男女,只要没出过痘的,都应该在五十丈外止步。

康熙帝玄烨刚出生时,正值天花大流行,不得不由乳母孙氏抱出紫禁城,来到北长街北口的福佑寺避痘。两岁那年,他仍然没有躲过天花的侵害,好在乳母悉心照料保住了性命。搬回紫禁城后,天花的阴影仍时时笼罩在他的周围。据《清文献通考》“王礼考”记载:康熙帝晚年回忆十分感慨,自己小时候为避免出痘,很早就被抱出宫,没有享受父母膝下的欢乐。

清代宫中人员众多,为避免有病例发生并造成大规模传染,康熙皇帝曾下令得天花之人不得进宫。据清代官书《国朝官史》记载,康熙十三年

(1674年)曾下令,宫中太监及宫中行走等人,如果家中有患天花的病人,治好的在家待一个月,尚在治疗的须在家住百天,然后才能进宫。隔离避痘法虽然简单,但效果良好。

“查痘章京”的职责

为有效隔离瘟疫,清廷设立了查痘官员职位,即“查痘章京”。当时天花病人几乎每年都有,宫廷规定,查痘的对象从八旗军民扩及京城住民、出洋贸易者,以及来京外藩。查痘章京一旦发现症状者,即进行隔离,要求患痘民众远离都城,或谕令未出过痘的外藩不能来京,隐瞒不报的从严惩处。

据俞正燮撰《癸巳存稿》记载,查痘章京专职负责八旗及京城居民的天花检查,凡是发现得天花的病人,一律要求迁移到单独的场所;在皇城对外宗室王公、公主郡主之家采取隔离性保护措施,即上述住宅一定范围内不允许天花病人进入;负责管理蒙古王公的进京事项,只有出过痘的官员才能进京。

清朝刊行的《海录》记载,凡是海上的船回国,或者有国外船只入港,须由查痘章京检查船上人员是否有天花病,若发现有病人,则要求治愈后才能进港。户籍管理方面,对于不同的居民,查痘章京要求标明是“熟身”还是“生身”。熟身的意思就是已经出过痘了,生身的意思就是没有得过天花。通过专职官员的检查,早发现天花病人,早隔离,以避免瘟疫传播。

(据《北京日报》)

朱元璋父子与中国茶文化

中华茶文化历史悠久。在历代帝王之中,明太祖朱元璋应该算是对茶文化贡献较大的人。

数千年来,中国人的制茶工艺和饮茶方式在不断变化。饮茶方面大体经历了“唐煎宋点明清泡”的嬗变。

唐代使用“煎茶法”,宋代使用“点茶法”。从北宋始,饮茶方式发展得越来越奢靡,据记载点茶法工序多达十三道。由于制作工艺的原因,高档茶叶成为当时的奢侈品。而宋代“团茶”将茶叶的贵重与奢侈推上了一个新高度。

团茶本是唐宋时期的皇家贡品,制作工序相当复杂,需要采摘、蒸熟、榨汁、压模、烘干等工序,制成“团龙”“团凤”的样子,然后加入各种名贵香料以及饰物——为的就是抬高其身价。当时,皇家对时尚起着强大的引领作用。看到皇家吃啥喝啥,上流社会便开始追风。就连欧阳修老先生也不能免俗,皇帝赏赐他一个团龙小饼,他爱如珍宝。茶叶很快成为时人相互攀比的道具。宋代达官贵人对于“斗茶”这一活动乐此不疲。大多数人的斗茶就是比拼谁家的茶更为名贵,并没有我们在书中所看到的那样高雅。此时,茶好坏的决定因素,已不在味道,而在价格。一碗茶喝到这个程度就有些变味了。

明洪武二十四年(1391),朱元璋下旨彻底废除团茶进贡,改为散茶。史料记载,朱元璋废团改散的目的

是为茶农减负,带头刹一刹这股奢靡之风。其实,散茶的饮用方式在民间已很流行,但贵族阶层对此颇为不屑,更甭提皇家了。朱元璋将从前难登大雅之堂的散茶引入宫中,彰显了倡导节俭、反对奢靡的决心。

朱元璋这道圣旨,对中国人饮茶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同时,还推动了茶叶加工技术的进步。团茶盛行的时代,人们看重茶叶造型,属于“表”的范畴;散茶大行其道之后,人们更加重视“里”,也就是茶的口味。由此,推动了茶叶加工技术不断创新,明清时期的红茶、乌龙茶等也应运而生。随着散茶的流行,茶叶价格不断降低,逐渐甩掉了奢侈品的标签。可以说,让茶走出庙堂走进了民间,促进全民饮茶之风,朱元璋可谓功不可没。

如果说,朱元璋废除团茶、提倡散茶,主要是为了反对奢靡之风的话,他的儿子朱权提倡散茶,则是由于他给饮茶定义了清新淡雅、顺其自然的风格。朱权是朱元璋的第十七子,这位对政治不感兴趣的王爷,对饮茶却颇有研究。他著有《茶谱》一书。朱权批评宋代团茶,破坏了茶叶的自然之美,他推崇简单、清幽、自然的饮茶方式,提出去杂取真才是饮茶本质。《茶谱》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,彻底将“唐煎宋点”变成了“明清泡”。这种饮茶方式也一直延续到今天。(据《今晚报》)